

# 刘禹锡诗选前言

成都无缝钢管厂《刘禹锡诗选》编写组  
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

刘禹锡是我国中唐时期（八世纪末期、九世纪前期）的法家政治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和进步文学家；诗歌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更具有革新的政治内容与优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特点，是值得重视的进步文学遗产和法家著作。

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自称中山（今河北正定）人，他的老家实际在洛阳。晚年官至太子宾客，故又称为刘宾客。他的生平事迹，略见于他临死前写的《子刘子自传》和《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他的主要著作，保存在宋人汇刻的《刘梦得文集》（又名《刘宾客文集》，包括外集）和清人编纂的《全唐诗》、《全唐文》里，计有诗约八百首，文二百多篇。

刘禹锡的一生，根据他生活和思想的变化，可分为青少年、中年和晚年三个时期。

刘禹锡的青少年时期（三十四岁以前，722——805年），到永贞革新失败为止。永贞革新是中唐时代一次旋风式的政治改良运动，它是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刘禹锡出生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十七年。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唐王朝的衰败是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反法尊儒、任人唯亲的反动政治路线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安史之乱的平定，并没有能消除引起唐代社会危机的根源，宦官擅权，藩镇割据，国家更加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官僚大地主与宦官相互勾结，把持中央的军政大权；宦官的权柄甚至扩大到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与宦官互相利用又互相争夺的地方藩镇势力恶性膨胀，父死子代，俨然是分封制的复辟。由于均田、府兵等制度的遭受破坏，土地兼并之风大盛，两税法、募兵制挽救不了中央集权的迅速崩溃，“进奉”、“宫市”种种苛征暴敛，更使农民的负担加重。朝政的腐败，激化了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起义运动，此伏彼起。在阶级斗争推动下，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愈见尖锐，地主阶级的中下层中出现了一股革新势力，力图对弊政有所改革，实现本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使阶级关系能有某些调整，使国家能够恢复统一，使社会危机能够有所缓和。这就是永贞革新的历史背景。

刘禹锡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中下层，他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两个皇帝：代宗李豫是靠宦官扶上“宝座”的脓包，德宗李适（音括）是朝令夕改、胡作非为的昏蛋。他们变本加厉地尊孔崇儒，特别表现在把大权交给宦官和对藩镇一味迁就的政策上。这种保守政

策只能把阶级矛盾更加推向激化,引起社会中下层的普遍不满。刘禹锡两岁的时候(773年),有晋州(今山西临汾)男子郇(音荀)谟在长安东市痛哭,请求取消宦官监军。他二十一岁的时候(792年),有许州(今河南许昌)人李狗儿持仗打入长安皇宫含元殿,殴击卫士。他二十六岁的时候(797年),有长安农夫因官市而痛打宦官。这些事件说明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公元780年,刘禹锡九岁,杨炎建议实施“两税法”,曾指出当时“上户优而下户劳”,因此引起人口流亡,“乡居地著者,十不四五”。公元783年,刘禹锡十一岁,野心家朱泚,利用兵变把德宗赶出长安,德宗不能不假惺惺地让陆贽代他写了一篇“罪己”诏,说:“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从这些官方文件的字里行间,我们很可推想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少年负志气”(《学院公体》)的刘禹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政治活动。由于唐太宗、武则天法家路线的影响,他和当时许多地主阶级中下层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堆床万卷书,学者识其真”(《偶作》),有去取地泛览“九流”、“百氏”(《游桃源一百韵》)。从德宗贞元九年到十一年间(793—795年),先后考上了进士、宏词和吏部取士科,获得了太子校书的职位。此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淮南幕府生活,接近了著名的经济、军事和历史学家杜佑。贞元十八年(802年),调补京兆府渭南主簿。次年(803年),入西京长安任监察御史,即与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吕温等结为一个政治集团,发动了永贞革新运动。

“永贞”是唐顺宗李诵的年号。德宗贞元末年,太子李诵周围就形成了一个旨在革新政治的集团。它以王叔文、王伾为首,以柳宗元、刘禹锡为骨干,号称“二王刘柳”。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805年),德宗死,顺宗即位,他们依靠顺宗的权力,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一场政治改革。改革的锋芒直指宦官、藩镇等反动保守势力,在政治上起用保守势力排斥的进步政治家,以加强革新派力量,在经济上把被地方藩镇控制的盐铁管理权收归中央,在军事上剥夺宦官控制中央禁军的兵权;又实行罢“官市”,免“进奉”,取消民间旧欠,查办贪官污吏,以调整紧张的阶级关系。这些措施,对于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具有进步意义。这一场革新的政治旋风,是在法家路线指引下对当时最腐朽最黑暗的反动势力的猛烈冲击。但由于革新运动仅仅在地主阶级内部、在上层统治集团中进行,它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本身,不可能提出解决社会危机的根本办法,也就不可能获得广大革命农民的支持,它的社会基础是很薄弱的。这次革新运动的阶级属性的局限,决定了“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藩镇割据势力没有坚决铲除,中央政权机构中的保守派没有迅速清洗,皇帝周围的宫妃宦竖还不免暂时利用,因而不可避免地落得一个失败的结局。革新运动进行不到五个月,以俱文珍为头子的宦官勾结地方割据势力和朝官中的保守派拼命反扑,顺宗李诵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迫“内禅”退位,王伾、王叔文先后遇害致死,革新派成员八人被贬为边远地区司马。刘禹锡去到朗州,就这样,结束了他后来所称为“少年曾得意”(《曲江春望》)的一场政治风暴。

刘禹锡的中年时期(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806—826年),是在贬谪生活中过去的。永贞革新失败后,他由工部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贬为朗州司马(806—814年),后转连州(815—819年)、夔州(821—824年)、和州(824—826年)等刺史,

所处的大都是僻远、褊小的地区。“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是刘禹锡自己对这一时期贬谪生活的概括。永贞革新代表一种进步思潮，尽管革新战士遭到贬谪，但革新的政治影响终于在元和年间（806—820年）通过有所作为的裴度、李愬等政治家、军事家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然而这一时期所经历的三个皇帝，仍然是不同程度的昏庸之主。藩镇势力没有进一步打击，宦官权柄更有所扩大，宪宗李纯和敬宗李湛（音站），都死在宦官手里。保守派规定被贬远地的永贞革新人士“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而且凭借种种口实，极力排斥、打击刘禹锡，致使他长期回不了长安。巴山楚水的贬谪生活固然使刘禹锡离开了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但同时却给他创造了接近社会下层的机会，使他对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危机有了更为深刻的感受。他选择了文学这个武器继续战斗。他在贬谪期间，特别是在朗州的十年，写了大量作品以表露自己块垒难消、孤愤不平的情怀，有力地反击保守顽固势力，宣传革新思想，歌咏国家的统一，鞭挞藩镇的跋扈。如果说，青少年时期的刘禹锡立志要作一个法家政治家，那末，这时候，由于环境的变迁，他又成为一个为法家政治路线的推行大喊大叫的进步文学家和杰出诗人。

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磨砺了刘禹锡，使他的法家思想愈益明朗。在《上杜司徒书》和《答饶州元使君书》里，他鲜明地表达了尊法反儒、厚今薄古的观点；在《奏议丞相府论学事》里，他尖锐地批评了尊孔派；特别是他在朗州期间参与了有名的一场关于天人关系的大论战，突出地宣传了作为法家政治思想基础的反天命哲学思想。这场论战是保守派的政治思想代表韩愈挑起来的。韩愈趁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而满腔愤恨的时候，向柳宗元进行关于“天管赏罚”的说教。柳宗元写了著名的论文《天说》，对韩愈进行反击。刘禹锡坚决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与柳宗元协同作战，在《天论》三篇中，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观点，并且把反天命与重法治的思想结合起来，明确指出：“人能胜乎天者法也。”他坚持的法家路线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是比较明确的。刘禹锡不仅是政治史上的著名法家，而且是哲学史上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

刘禹锡由和州刺史奉召回朝以后，进入了他的晚年时期（五十六岁至七十一岁，827—842年）。这一时期，他除了在长安作礼部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828—831年），在苏州（832—834年）、汝州（834—835年）、同州（835—836年）三个地区作刺史以外，其余时间，都在东都洛阳，最后官做到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尽管他不断遭到保守派的谤讟，“不得久处朝列”（《旧唐书·刘禹锡传》），但究竟和巴山楚水的弃置生活大不相同了。这个时期唐王朝政局更加动荡，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统治政权内部的官僚集团掀起了剧烈的朋党之争，给宦官掌权制造了机会，使刚刚受到制裁的藩镇凶焰复张。这一时期的两个皇帝：文宗李昂、武宗李湓（音缠），都是宦官拥立的。文宗曾慨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他想摆脱朋党的纠缠，打击宦官的骄恣，结果在一次政变中，自己进一步变成宦官掌握中的傀儡。“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处于这样昏暗时代的刘禹锡，并没有因为晚年生活稍安而忘掉革新事业。“朔风悲老骥”，他仍然渴望登“远道”，“驰绝塞”（《学院公休》）。直到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因患足疾，困卧洛阳，还用“秋风”的到来象征他所理想的法家

政治路线的实现，高吟：“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种力求振作，积极向上的法家革新精神，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

但是，刘禹锡究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不可能没有历史和阶级所加于他的局限。在二十三年愤恨不平的贬谪期间，他已经不免通过寄诗文、写书信向有力者求援，流露了一个改良主义者的不彻底性。朋党之争，混淆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界限，这当然是他晚年在政治上难于插手也不愿插手的一个原因，但他对朋党之争所采取的态度也是有问题的。他极力回避在牛（僧孺）李（德裕）两党所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表示自己的看法，牛李两党的头目，他都与之周旋，尽量保持私人交情。这难道不是由于他晚年地位有些变化，锋芒也就有所收敛了么？对于刘禹锡生活和思想的变化，我们应该如实地作出应有的评价。

## 二

毛主席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刘禹锡是永贞革新运动的中坚分子，他的诗歌为地主阶级革新派服务，为法家政治路线服务，旗帜十分鲜明。

在政治上主张革新，反对保守，是刘禹锡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这样闪烁着除旧布新光芒的警句，的确代表了刘禹锡政治诗的主题。当时的一群反动统治者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用人唯亲，上吹下捧，刘禹锡把他们比作“漠然丧其晶”的“昏镜”和酷爱“昏镜”、“陋容”“自欺”的蠢家伙（《昏镜词》，这一节所举的例子都是选入本书的作品）。这些蠢家伙大开倒车，甚至想把社会拖回到塞聪蔽明的“轩后初冠冕”时代（《讽古》）。刘禹锡向他们大声疾呼：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金陵五题·台城》），象陈叔宝一样腐化享乐，就会破国亡家！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矛盾，刘禹锡通过《养鸚词》、《贾客词》、《武夫词》、《崔元受少府自贬所还遣山姜花以诗答之》等一系列作品把它形象地反映出来。在刘禹锡看来，那些醉心于保守的家伙，没有觉察到这种危机，真象被“春色”“曠”得发“狂”的精神病患者，该吹起一股“清入骨”的“秋”风，让他们醒悟过来（《秋词》）。可是，“唱尽新词欢不见”（《踏歌行》），永贞以后，真正醒悟过来，能寄托革新希望的君相找不到了，刘禹锡不胜愤恨，但他也只能愤恨。

革新与保守的斗争还突出地反映在统一还是分裂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保守派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地方割据势力。刘禹锡坚决主张削平藩镇，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在《平蔡州》、《平齐行》等著名的诗篇里，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政治主张。割据势力鼓吹什么“王气”、“地形”，大造反动舆论，妄图负隅顽抗，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对准这些腐烂发臭的论调，狠狠地投出锐利的批判匕首。刘禹锡认为，只有铲除这些分裂河山的顽固堡垒，才能“四人归业闾里闲”（《平蔡州》），“耕夫满野行人歌”（《平齐行》）。这些作品，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群众渴望统一的历史趋向。

和政治上主张革新、反对保守一致，在思想上宣传唯物主义的“人治万物”（《天

论》上)，反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是刘禹锡诗歌的又一重要内容。“常谈即至理，安事非常情？”（《高兴》）刘禹锡的许多诗篇，都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嘲笑孔孟徒、玄学鬼的奇谈怪论。作为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刘禹锡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看法与那些孔孟徒、玄学鬼有根本的分歧，他认为旧事物为新事物所代替是理所当然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诗以寄》）这是“常谈”，也是“至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一切反动派都害怕这个规律，他们总是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谬论来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刘禹锡没有为这种反动叫嚣所吓倒，他那种新催陈、前让后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使他坚定地相信革新派必然要战胜保守派，因而他为革新事业战斗，“心如砥柱”（《咏史》），“波浪不能摧”（《竹枝词》）。他曾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响铮铮的语言回答白居易“命压人头不奈何”的劝慰（《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沉舟”、“病树”表面上看去是自嘲，实际上自己不进步反而妄想阻止历史巨轮前进的恰恰是保守派，这两句话就成了以自嘲为形式的嘲他。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借用这种名句来形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进步力量面前的无可奈何状态。

一切政治上的保守派、思想上的玄学鬼都是孔孟信徒，刘禹锡的进步诗歌是瞄准保守派、玄学鬼的投枪，这一点还表现在尊法反儒的严肃态度上。在《庭梅咏寄人》里，他歌颂“犯寒”、“苦酸”的梅树，锋芒是对准儒家的“中庸之道”的；在“讽古”和《经檀道济故垒》里，他赞扬工于朱墨的苏绰，惋惜惨遭枉杀的檀道济，矛头是指向儒家的“去食去兵”的。他用向往的感情，歌颂了余威显赫的秦始皇“赭山”（《看山怀古》）；用轻蔑的口吻，嘲笑了奴颜婢膝的反动儒生“腰如磬”（《学阮公体》）。这一类对法家儒家爱憎分明的诗歌，刘禹锡作品里是不少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唐时代，政治上保守与革新的斗争，思想上唯心与唯物的斗争十分激烈，这是儒法斗争在那一时期的具体体现。刘禹锡主张革新，反对保守，宣传唯物，反对唯心，他那种鲜明的法家思想，决定了他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无庸置辩的进步意义。

毛主席在谈到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时，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并且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刘禹锡诗的进步政治内容，是通过它精巧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刘禹锡把诗歌作为反天命、反保守的政治斗争武器，因此，他的诗批判色彩十分鲜明。这样讲，当然不是说刘禹锡诗没有用优美的形象来咏歌他的革新理想；正象许多法家著作从破中立一样，他的革新理想往往通过对黑暗保守势力的批判体现出来。新旧两部《唐书》都咒骂刘禹锡“褊（音匾）心”（《刘禹锡传》）。什么是“褊心”？“褊心”就是不讲儒家的“中庸之道”，要骂人，要斗争。“唯是褊心，是以为刺”（《诗经·魏风·葛屨》），很不“温柔敦厚”。但是，诗歌总要通过艺术形象来“言志”；刺，也得讲求艺术。古代许多进步诗人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往往采用比兴手法。比兴手法总是借助于象征性的艺术形象，以启发读者的联想，来表达诗人所不能直接抒写的感情。刘禹锡和历史上的进步诗人一样，巧妙地运用这种手法来进行战斗，来痛刺保守派，这就形成了他诗歌“讽托幽远”（《新唐书·刘禹锡传》）的著名特色。刘禹锡的战友柳宗元，曾用“俊而膏，味无穷而炙（音至，煎，烤）愈出”来

描写他诗文的风貌，刘禹锡很同意这个说法（《犹子蔚适越志》）。所谓“俊”，就是用精练的笔调；所谓“膏”，就是有普遍的意义；这是讽刺艺术的特点（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味无穷而炙愈出”，通过比兴手法来达到高度艺术水平的讽刺作品，是经得起反复寻味的，这就是“讽托幽远”这一特色的说明。《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绝句》两首诗，用玄都观的桃花，形象地勾画出二十多年新、老保守派又勾结又倾轧的兴衰史，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保守派一看到就气急败坏，狼狈不堪。在刘禹锡的笔下，“讽托”尽管“幽远”，反动的保守派也嗅得出来。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讽托幽远”是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在反动势力猖狂一时的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艺术形式。这种形式给我们理解刘禹锡诗带来了一些困难。毛主席在评价鲁迅时曾指出：“鲁迅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去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又指出：“我们要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这段教导，很可以启发我们如何去看待刘禹锡诗“讽托幽远”的历史背景，正确评价它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刘禹锡对当时的黑暗社会进行揭露和批判，应该特别提到他所写的那一批以鸟兽虫鱼为题材的政治咏物诗。根据这些鸟兽虫鱼的某种特征，刘禹锡赋予它们的性格以社会意义，又替它们涂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捧鲜望青玄”的水獭（《有獭吟》），“唧唧满庭飞”的鸚鵡（《题鸚鵡吟》），“舌端万变乘春晖”的百舌鸟（《百舌吟》），“鹰隼仪形蝼蚁心”的飞鸞（《飞鸞操》），“喧腾鼓舞喜昏黑”的蚊虫（《聚蚊谣》）：百兽率舞，魔怪踰跼。如果我们再加上柳宗元所描写的“至死不悟”的临江小鹿，“庞然大物”的贵州驴子，“盗暴尤甚”的永州老鼠（《三戒》），“伺人隐微失误”的尸虫（《骂尸虫文》），“捷取巧噬”的腹蛇（《有腹蛇文》）等等，简直是中唐时代上层社会一切害人虫五光十色的漫画走廊！刘禹锡用诗歌，柳宗元用文章，同样反映了这个时代，同样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不是偶然，而是他们站在革新派立场，向保守势力发动一次联合进攻的战果。刘禹锡的诗歌是杂文式的讽刺诗，柳宗元的文章是讽刺诗式的杂文。这是韩非寓言的发展，是儒法斗争在文艺史上值得特写的一页。

刘禹锡诗在艺术上取得的这样不寻常的成就，除了和他革新的政治斗争有关外，刻苦地向古代和当代进步诗歌学习也是一个原因，但重要的还在于他学习民歌。他的《竹枝词引》，极力称赞先秦法家诗人屈原学习民歌的成就。他沿着屈原的创作道路，更有所发展，加工改写了西南各族人民从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对歌、联舞曲词，认真从中吸取营养。《竹枝词》、《踏歌词》、《浪淘沙词》、《杨柳枝词》等就是他学习民歌的丰硕成果，也是他所写的政治抒情诗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发展史上，“诗”变为“词”，这是一项革新；而刘禹锡的这些歌词则是其较早的作品。

作为封建社会中期的地主阶级革新派，刘禹锡的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他的诗歌中来。在《武夫词》里，他谴责破坏法纪的一群滥兵恶棍，把矛头指向盗窃兵权的宦官，揭露得很深刻；但他却认为这一群恶棍的阶级基础是“编户人”，而且“无种取侯王”一句，还把这些家伙的趁机窃权与农民革命相提并论，明显地暴露了他敌视农民革命的地主阶级思想，就是一个例子。刘禹锡的晚年，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差的

作品越来越多。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刘禹锡渐渐地远离了这个唯一的源泉，所以晚年所作，比之中年绚烂多彩的篇章，就显得褪色了。对于刘禹锡的作品，我们必须坚持“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马列主义文艺批评原则，有所采取，也要有所删除，“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 三

刘禹锡的诗歌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他的政治诗是在反动派一片咒骂声中写出来的。他用诗歌向保守派开火，几次掀起轩然大波。反动派制造种种舆论，说什么他“恃才而废”，“不能无怨望”呀，说什么他作诗“以诋权近”，“闻者益薄其行”呀（《新唐书·刘禹锡传》）。总而言之，他“居心不正”（《容斋续笔》卷七），诗文也就不足取了。柳宗元很为此不平，曾借和刘禹锡讨论书法的机会愤慨地说：“世上悠悠不识真！”（《重赠》）这是对那些流言蜚语的有力回击。“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很爱刘禹锡诗，曾经亲手抄录（《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引《雪浪斋日记》）。历史上尊法反儒的进步作家和评论者，对于刘禹锡诗的估价都是很高的。

但是，刘禹锡身前身后经历着漫长的黑暗封建统治，反动的保守势力气焰嚣张，他们总是对刘禹锡进行恶毒的攻击。永贞革新时代，孔孟信徒韩愈已经骂刘柳是“小人乘时偷国柄”（《永贞行》）；直到一千年后，清嘉庆帝颙琰，还是暴跳如雷，诅咒刘禹锡“趋炎乱政”（《咏刘禹锡事》）。反动派攻击刘禹锡，还拼命毁谤他有战斗性的诗篇。刘禹锡的诗，真象他所歌咏的一粒一粒金子，被尊儒反法的“狂沙”沉埋了一千多年（《浪淘沙词》）。尊孔派的评论者，一谈到刘禹锡的诗，总是肆意歪曲，尽量贬低。宋代的魏秦，骂刘禹锡“不自知”，甚至于白居易称道“沉舟侧畔”等句子，也被攻击为“不善评诗”（《临汉隐居诗话》）。清代的方东树，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无甚奇警”，“又无自己在诗内”，因而连“七律似梦得”的王安石也一起遭到攻击（《昭昧詹言》卷十八）。就这样，刘禹锡诗长期以来很少人去研究，没有出现过有注释的本子。

一千多年过去了，我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号召，要评注法家著作。刘禹锡和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及其著作，一个一个得到认真的研究，被反动儒家颠倒了的历史都将颠倒过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的新旧斗争，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进行交锋的反映。全国人民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正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加强团结，反对分裂；坚持继续革命，批判因循守旧。在这样的伟大时代，回顾中唐时期激烈的革新与保守两条路线斗争，读一读刘禹锡顶颞波、战恶浪、激壮心、长精神的诗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编注了这部《刘禹锡诗选》，目的是想在用马列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战斗中，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根据“古为今用”、“批判地

接收”的原则，对刘禹锡和他的诗歌作出应有的评价；为工农兵着想，扫清刘禹锡诗歌在阅读上的障碍，提供刘禹锡政治诗的一个通俗读本。

这个选本，选入了刘禹锡诗七十二首，约占他诗全部的十分之一。编排次序，略依写作时代先后；选入的诗都参校了刘禹锡著作现存的各种重要版本，字句歧异的地方，根据我们的判断，选用了一种，异文都略去不再标出；注释力求通俗，也适当地收进一点历史、语言资料；评语只抓重点，不要求面面俱到；为了便于工农兵读者理解原诗，在诗后附上了译文；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所选诸诗的写作背景，在书末附录一个《简明刘禹锡年表》。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闻见有限，又加时间比较仓卒，所以错误的地方一定是不少的，希望读者提出批评，以便及时改正。

一九七五年六月七月初稿；

八月八日修改稿